

美国学者论中国经济

——尼古拉斯·拉迪教授访谈录

梅 俊 杰

编者按:

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R. Lardy),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地处首都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他从60年代起即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撰有《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布局》(1978)、《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陈云关于中国发展的战略》(合编,1983)、《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济部分,1987)、《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改革,1978—1990》(1992)、《中国在世界经济中》(1994)等专著,现集中研究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金融体制。在密切关注中国经济的同时,拉迪教授近年也非常关心中美关系,曾多次在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支持中国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12月上旬拉迪教授访华期间,于12月8日在上海锦江饭店接受了本次采访。

●拉迪 ○梅俊杰

○ 作为对中国经贸深有研究的学者,你对中国经济的总体绩效有何印象?

● 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发展迅速,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递增,这样,产值增了4倍多,按大多数指标计算,都是世界上一个国家最快的增长了。中国的增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的2倍以上,甚至也超过了经常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具活力地区的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国较为成功的经济过渡战略,一方面围绕改革展开,即建立各类市场,以取代政府对资源(特别是投资)的直接配置。在这方面,商品市场发展最好,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迟缓些,当然,这中间,农村的劳动力配置和城市的土地配置市场化步伐又稍快些,而金融市场的发育差得多,政府仍配置着可观的金融资本。经济过渡战略的另一方面则围绕开放展开,即着力扩大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度。

从参与国际经济,或具体地说,从外贸和吸引外资角度观察,改革开放起步时,中国在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上均无足轻重,其经济与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然而,到90年代初,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已完全变了样,1992年,它实际上已是全球第10大出口国,仅次于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工业国,1993年,其进出口额占世界贸易的份额首次超过本国1928年占世界2.3%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外来援助重要的接受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主要的借款者,特别是它在90年代前期吸引了惊人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

○ 如果与东亚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又呈现何种景象呢?

● 中国与东亚高绩效(high-performing)的经济具有不少相似之处,如储蓄与投资率较高、注重基础教育、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人口出生率降低、制成品出口快增、全要素劳动生产率较高等。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快速增长不是什么反常现象。但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或者说不利方面。

第一,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可耕地比亚洲其他地区显著地低,甚至低于孟加拉国,这就向维持足够农业增长率的目标提出了挑战。

第二,中国公有制的程度和由公共投资的份额大大高于东亚高绩效经济,大量公有公司出现亏损,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从拨款改为贷款,由此造成中国国有银行体系十分虚弱。按数字这一指标,这几年来问题在日益加重。有关国企改革问题,我认为中国过分强调兼并和延续,而未足够重视破产和关停。兼并中这些企业并不是都可以由其他企业吸纳的,那样只会削弱强势企业。自从破产法通过以来,破产的企业数量极小,而在市场经济中,每年大约有1%的企业破产。国有企业是个最大的问题,只有改变了它们,才可改变银行。自1993年中国强调银行商业化以来,这方面的进步十分缓慢。由于缺乏理性放贷的经验和能力,以及国家不愿批准设立私有银行,改革之后仍为国有的银行能否按商业原则运作令人怀疑,况且困境中的现有专业银行要按商业原则运作,必须先靠发售股份或政府财政投入进行再资本化,但能否办到仍有问题。

第三,与东亚高绩效经济不同,中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外资来创造出口,特别是制成品的出口,其大多数制成品的出口是由三资企业或与海外企业关系密切的中国企业创造的,比如1992和1993年,占中国产值比重很小的三资企业却在同期新增出口中占了大约2/3,而1992年制成品产值占到约一半的国有企业却对新增出口贡献很小。因此,中国不象东亚高绩效经济那样成功地让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长带动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较高增长,中国产业的很大一部分可能根本没有参与这一进程。

第四,中国与东亚高绩效经济在收入分配上差异显著。虽然以往十几年经济增长的好处被广泛地分享,但中国还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首要的是,城乡生活水准差距继续比亚洲其他任何地区都拉得要大多,尽管分开算的话,城市和农村内部的不均程度都低于亚洲其他地区。

○ 在这一背景下,根据你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如何?

● 与东亚高绩效经济正反两方面的比较表明,中国在本世纪末以前的经济增长率应该能较多地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明确地说,具有维持6%以上增长率的合理前景。如果国有企业、银行体系和财政体系能成功地推进一些正确的改造方案,那么甚至会有类似以前长期取得的9%的年增长率。我的测算依据了上面基本展示的世界银行对东亚高绩效经济的分析框架,也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在缺乏进一步重要改革措施后增长滞缓的趋势,同时也以政治局面不对经济构成破坏性影响为前提。

○ 中国贸易增长的前景又如何呢?

● 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贸易增速是世界贸易增速的2倍多,这是中国进入世界10大

出口国行列并在世界贸易中急剧扩大份额的根本原因。现在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再是这种过度良好的表现是否能继续,而是它何时将停止。中国近期贸易增长快速的原因之一是,它在从改革前人为压低的低水平上恢复过来。至于中国贸易的增长前景,我想主要取决于其出口的增长前景,因为我不相信中国进口的增长会明显地高于或低于其出口的增长。而出口的增长前景将取决于供应与需求两个方面,即中国为世界市场增加生产的能力和世界市场吸纳更多中国产品的能力。以此观之,如果中国执行较好的国内政策、汇率政策,等等,同时能继续享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国际贸易制度不退向严重的保护主义,那么中国到世纪之交还会有较快的进出口增长,并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贸易国。事实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并不高,仍有发展余地,特别是还大可向发达国出口质量与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但能否冲破其保护主义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关键。不过,总的来看,中国贸易的增长率很可能在本世纪末开始与世界贸易的增长率趋同。

○ 有关中国经济的增势与规模,国际上有一些夸大甚至扭曲的说法,鉴于这与中国以何种身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恰当地估算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份量显得颇为必要。请你介绍一下你在这方面的见解。

● 在某些层面,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贸易国以及国际资本市场上有力的参与者被视为对美国 and 欧盟利益构成了威胁,西方对此有不少的推测。我想,有关中国会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强国的观点部分地来自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那份影响甚广的《世界经济观察 1993》(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即将赶上日本)以及 1992 年 12 月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到 2010 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我首先要说,读这些报告的许多人只记住了中国经济规模将居世界之首的观点,而轻易地忘记了这个事实,即中国的人口有 12 亿,而且未来几十年还会增加数亿。其次,《经济学家》的预测是以中国 1990 年人均收入已达近 2600 美元为依据的,而这几乎是目前对中国富裕程度的测算中最高的数字,比如,我就认为中国 1990 年的人均收入只是 1000 美元左右。此外,不能由中国近年非凡的增势而向未来直线外推,或许更可合理地假定,经济改革带来的增加生产力的效果会在世纪之交时丧失,那样,中国的增长率在绝对意义上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都将降低。根据我的推算,以中国 1990 年人均收入 1000 美元为基点,若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增速之比在 2000 年后由 4:1 降至 2:1,则中国的绝对经济规模要到大约 2040 年才会超过美国;若人均收入增速之比在 2000 年后由 5:1 降至无限期的 2:1,则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超过美国还需要更多的年份。

○ 不过,如你所知,恰恰由于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常规意义上的超强经济国,西方有些人就认为,中国会凭借其较低的人均收入,通过已有较高水平的外汇收入进口先进的西方技术,创造某种难与竞争的低工资、高科技型经济。这种判断有何不合实情之处?

● 通观中国改革以来的对外贸易,大多数年份中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既然外国对华销售能够大于中国向外国的销售,所谓发达工业国难与竞争的推测便没有什么根据。而且,由中国贸易的商品构成看,从 80 年代后半期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出口改变了此前依赖能源和农业产品、比较优势原则不起作用的局面,大量增加出口了纺织品、服饰、鞋类、玩具、体育用品以及加工组装的机电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使贸易与自己的比较优势越来越一致。而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有一个关键特点,即所有国家都从这个自愿的交易过程中受益。

在此交易过程中,中国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市场,吸纳着西方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货物,如机器、交通设备,等等。因此,中国的全球贸易收支和贸易产品构成并不表明,先进工业国会丧失与中国竞争的能力。

○ 与此相关,中国的经济开放度你认为达到了什么程度?

● 当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力图继续保护其大范围的国内制造业,使其免遭国际竞争的强烈冲击,这是不奇怪的。但除此之外,我相信,在某些关键的方面,中国可能已经比在经济发展可比阶段时的日本、台湾省和韩国更多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甚至放在现阶段比,中国在某些指标上都已比这些国家或地区更为开放。我这样说显然不是根据其外贸依存度,因为经济开放度可以由其他指标来衡量,如:外商直接投资的广度、外资企业在出口创汇中的重要性、国内企业获得海外零部件的能力、向外直接投资的程度、证券市场向海外投资者开放的程度,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经济至少在可比发展阶段上,比日本、台湾省和韩国更为开放。根据当今多达40%的世界贸易是公司内部贸易(即在跨国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之间)、贸易随投资而来这一事实,又根据日美贸易不平衡源于日本对美国投资的接纳程度大大低于美国对日本投资的接纳程度这一普遍看法,中国对外资的开放将为投资者带来大量贸易机会。事实上,虽然传媒把焦点集中于双边贸易不平衡,但中国的确已成为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中增长最快的大市场。

○ 最后,作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济部分的作者,你如何看待莱斯特·布朗有关中国粮食问题的报告?

● 布朗预测了两件事,第一是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下跌;第二是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增加需求将抬高世界粮价,我认为这两点都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布朗就中国的耕地和种植情况作出了非常武断的结论,他低估了耕地和种植的数字,从而高估了单产。可实际上中国的单产水平并不处在世界前沿,其耕地和种植也不会急剧减少,我认为中国有能力增加其粮食产量。其次,虽然中国可能会进口更多的粮食,但动态地看,我不相信中国增加进口会对世界粮价有任何影响。我认为供应的弹性是很大的,如果价格稍微上涨一点,就会增加很多产量,特别是在北美洲,我们很容易成倍增加产量。事实上,几十年来,世界市场上粮食价格的长期趋势,按可比价格算,是在下跌,如今世界市场上小麦和大米的实际价比50年代要便宜很多。因此,我认为布朗有关中国和世界农业形势的景象是十分扭曲的,预言中国增加需求会导致其他国家的饥荒,坦率地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